

马克思主义 传播在中国

主办单位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承办单位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 中央编译出版社
上海图书馆 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博物馆(筹)

第一章 西学东渐

近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译介



广学会旧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不满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主张变法维新，想从西方寻找一条“救国”之路。他们掀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组织学会、建立书局、创办报刊、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思想。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向西方探求新思想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想，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介绍被零星地刊登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最初的译介虽未引起社会重视，但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看，仍然具有肇创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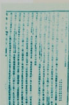
《万国公报》 中文报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传入中国的。为了传播宗教教义和改良主义学说，他们在译介西方著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零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史籍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广学会（英国伦敦布道会在上海创立的出版机构）的传教士韦廉臣于1887年创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万国公报》第121期上，刊载了由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赫德所著的《社会的进化》一书，译名为《大同学》。文中提到的“马克思”、“马客偈”和“恩格斯”是迄今所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早译名。



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
李提摩太（1845-1919）



马克思中译名种种

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披露世界有位“百工领袖马克思”、“马客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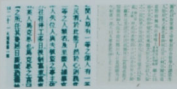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革命者赫德之学说》中提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

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中提到了“加陆·马陆科斯”；《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发行的《社会主义神髓》译为“马尔克斯”；《浙江潮》第8期刊载的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译作“埋哈司”。

1906年，朱执信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译作“卡尔·马尔克”。

1919年，《新青年》杂志开始用“马克思”这个译名。

1920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用的译名是“马格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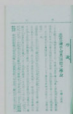
梁启超

第一个在著述中提到马克思名字中国人

1902年9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对马克思作了简要介绍:“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今日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1903年9~10月,他在《新民丛报》第40-43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谈到马克思:“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德国人,著书甚多。”

1904年,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和1906年答某报》中又多次提到马克思。



梁启超
(1873~1929)

孙中山

最早推崇社会主义的圣人马克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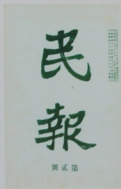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

最早有意识、有目的地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同时,还十分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

据考证,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后,常到大英博物馆去读书,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宋庆龄回忆说:“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了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1905年8月,他在东京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创刊机关报《民报》,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1912年10月,他在演说中说:“厥后有德国麦司者出,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有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他赞誉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集几千年人类思想的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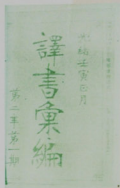
马君武

首次在中文报刊上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

马君武乃民国元老，同盟会第一任秘书长。在孙中山的影响下，他大力宣传《共产党宣言》思想。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由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杂志《译书汇编》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写道：“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还在文中列举了26部研究社会主义的参考著作，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5篇马克思主义著作。这是最早在中文报刊上介绍马克思著作的书目。



马君武
(1881~1940)



《近世社会主义》

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



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赵必振翻译的日本人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有“加路·马陆科斯及其主义”一章，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马克思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介绍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有力之同志”，“野契陆斯与马陆科斯相亲善，始终同其难苦”；并简要说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译作《共产主义宣言》）《哲学的贫困》（译作《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译作《经济学之评论》）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作《英国社会劳动之状态》）等著作的写作过程。

朱执信

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学说

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并摘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国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它的一些成员介绍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署名蛰伸。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并节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10项纲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著文介绍《共产党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

1906年6月，朱执信在《民报》第5号上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说社会主义“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



朱执信
(1885~1920)



朱执信（前左）
与廖仲恺等（1918年）

刘师培

最早在《天义报》发表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文



刘师培
(1884~1919)

在同盟会成员中，有少数人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为了适应需要，他们也介绍和翻译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片断。1907年6月，刘师培等人在东京成立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出版机关刊物《天义报》。

1907年12月，《天义报》第13、14卷上登载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并以附录的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

1908年1月，《天义报》第15卷刊载了民鸣（刘师培）根据日译本转译的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写的序言全文，标题为《共产党宣言序言》。这是迄今查到的最早的恩格斯著作的完整中译文。



《近世界六十名人》 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

1907年，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收入近代60余世界名人的照片，其中刊登了马克思于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的肖像，时年57岁。这部图书用8开道林纸胶版印刷，由法国巴黎印成后运回我国国内发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一肖像后被1920年8月出版的中文第一全译本《共产党宣言》作为封面，并用于其他中文版的马克思著作。曾被印于苏维埃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上。至此，马克思的名字、学说和形象都已传入中国。



《近世界六十名人》扉页



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肖像

第二章 历史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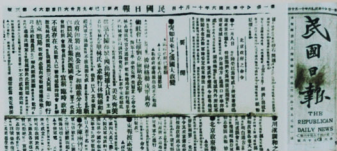
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十月革命引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很快接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在众多的思潮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抉择，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许多报刊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民国日报》等报刊 第一次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三天后，孙中山指导下的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简要报导了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克伦斯基政府、布尔什维克党已组织新政府并占领京城的消息。同时，上海的《申报》《时报》，北京的《晨钟报》，天津的《益世报》等一些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也都迅速作了报导。



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

《东方杂志》最早介绍列宁的生平事业



1918年3月，译者“善斋”根据东京《日日新闻》所载，翻译了由布施胜治撰写的《述俄国过激派领袖列宁》一文，《东方杂志》第15卷第3号刊载了列宁的照片和介绍列宁生平事业的文章：“列宁幼年时代，尝慨叹国民教育之不振，民众之愚昧，下层人民之贫困，咒诅俄皇之专制政治”。为了推翻沙皇专制主义的统治，他不仅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而且通过各种杂志“发表其言论，鼓吹其主义”，同时“出版浩瀚之著作多种”，主张“政权全部当归劳兵会掌之”，并“生平抱定宗旨，始终不变其主义”，且为实行其主义，“无论若何危险，皆不足以使彼屈服”。

《晨报》首次发表 记述十月革命后苏联政治生活情形的作品

1919年4月,《晨报》连载了《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一文,副标题是“实行社会主义之俄国真象”,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十月革命后苏俄财经、政法、军事、文教各方面的情况。该文是我国报刊上首次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情况的作品。

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晨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去莫斯科实地考察。两年中,他写下了许多通讯。其中从1921年1月起连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通讯集,对苏俄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工人组织、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作了系统的报道和介绍产生了重要影响。



瞿秋白
(1899-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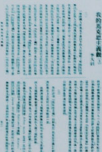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



李大钊
(1889-1927)

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趣和向往,其中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18年起,李大钊通过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组织社团、创办刊物等方式,努力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拓荒者。1918年7月,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认为俄国事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阴谋”,而是一场真正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11月,他又在北大与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讲会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在《新青年》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指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此后,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他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勇往奋进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殚精瘁力以成之”,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杨明斋住处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施存统等。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各种方式宣传和译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组织工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后来，由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首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筹组自己的组织起，就坚定地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本党的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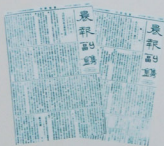


陈独秀
(1879-1942)

1920年11月陈独秀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

1919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除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马克思生平简介之外，还刊载了马克思的原著译文。为纪念马克思101岁诞辰，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1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晨报》是影响较广、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因此专栏的开辟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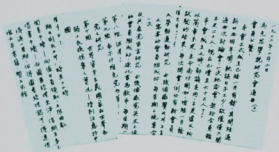
《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



李大钊与《晨报》编辑部同人
在北京中央公园合影

北京大学组织成立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倡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设有3个特别研究组和11个固定研究组，会员共60余人。为了迷惑敌人，他们经常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研究会会员一面通过各种形式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使研究会成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中心，一面积极声援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2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在京合影

北京大学建立 第一个共产主义图书收藏室“亢慕义斋”

为解决马克思主义原著和相关书籍的来源，李大钊在北大西斋（今景山东街）学生宿舍里存放了很多英文、法文、俄文、德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人们习惯称这里为“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译音，意为“共产主义小室”（Das Kommunistisches Zimm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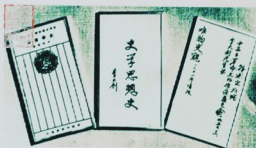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亢慕义斋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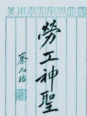
李大钊开中国大学讲授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

从1920年起，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史学、政治学等系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5门课程，编写了《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等专著和讲义，开中国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北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在“唯物史观”的试卷中，阐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称“马氏真不愧为纪元人”。李大钊对这份答卷给出了95分。



《新青年》首次发刊“劳动节纪念号”

1919年5月1日，北京《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刊，全面报道了国际劳工运动的情况，李大钊的《“五一节”杂感》，首次向国人介绍“五一”节的来历。1920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期“劳动节纪念号”，是首次介绍和报道“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一期专刊。该期刊有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题词“天下为公”，封面是套红的一幅罗丹的“劳工神圣”，扉页上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题字“劳工神圣”。这期刊有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还有各国劳动运动史，附有反映当时工人生活状况的33幅图片，以及12位工人对劳动节的亲笔题词，表达了劳动者的自豪及对8小时工作制的向往。



外国语学社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苏俄线路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苏俄成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这条途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东方线路”，主要汇聚了外国语学社学员、旅欧的学生和上海大学的学员。1920年8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址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即上海外国语学社，这也是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杨明斋任社长，俞秀松任秘书，学员包括后来成为我党领导人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1920年冬到1921年春，学社将学员分三批送到苏俄，俄共（布）还专门创办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3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也从欧洲来到东方大学，汇入了留俄生的行列。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又有大批党的干部和学生前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他们积极译介和宣传马列主义，特别对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外国语学社旧址（现淮海路567弄）



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
在莫斯科（1923年4月）

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并创办《湘江评论》周刊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罗章龙等13人在蔡和森家里召开“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学会的宗旨是“砥砺品行，革新学术，改良人心风俗”。五四运动期间，学会经常组织会员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思想上、干部培养上作了重要准备。次年7月，毛泽东又主编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湘江评论》周刊，传播、介绍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湘江评论》创刊号



周恩来在天津创办 “觉悟社”和《觉悟》杂志

1919年9月，周恩来联络20多名有志男女组成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的宣言声明，“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适应于‘人’的生活——做学生方面的‘思想改造’事业。抽象的话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觉悟社成立不久，请了李大钊等许多革命思想的传播者来讲课。1920年1月起，觉悟社还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由周恩来担任主编。由于周恩来深邃的思想、出色的组织才干，觉悟社成为五四时期的重要社团。



1917年的周恩来



觉悟社部分社员（1920年8月）

恽代英在武汉创办 “利群书社”和《中国青年》杂志

恽代英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2月创办武汉地区最大的进步社团“利群书社”，其宗旨是集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吸引着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和群众，是武汉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重要阵地。董必武、陈潭秋等也经常来此阅读马列主义书籍。恽代英还创办和主编了《中国青年》，撰写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受到广大青年的衷心爱戴和崇敬，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恽代英
(1895-1931)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19年秋，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望道，收到邵力子发来的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邀请。于是他依据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参考了陈独秀取自北大图书馆的英文本，在家乡义乌的柴屋里，“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

1920年5月，陈望道带着译稿赶赴上海。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得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已经译出，决定资助出版。为此，在上海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名叫“又新”的小印刷所。1920年8月，《宣言》中文全译本终于在上海问世，所印千余册很快赠售一空。



陈望道
(1891-1977)



其他五种《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和传播，对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发起和组成、以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刘少奇曾经回忆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共产党宣言》的情形：“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邓小平也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

华岗译本

1930年由华岗翻译、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译本，是我党成立后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初版的华岗译本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书名为《宣言》，出版社署名为“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版本的特点是：三个德文版序言首次与我国读者见面，后半部附有恩格斯亲自校阅的1888年英文版全文，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英文本《共产党宣言》；采用英汉对照形式出版《宣言》在我国也属首次，更利于《宣言》思想的准确传播。

华岗（1903~1972）



成仿吾、徐冰译本

1938年，成仿吾在延安陕北公学任校长，徐冰在《解放日报》任编辑，这一年中宣部得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让他们翻译。于是，他们把书分成两部分，成仿吾译前半部，徐冰译后半部，利用业余时间译出。同年8月该译本首次在延安刚成立的解放社作为“马恩丛书”第4种出版；9月又在武汉和上海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出版社、新中国出版社、新文化书房等出版。该译本是解放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还首次在书前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标准像。这个版本不仅在各抗日根据地广为传播，在国统区也传播很广，甚至还流行到敌占区。



成仿吾
(1897~1984)



第三章 焕然一新

建党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和传播



中共“一大”会址
(观兴业路76号)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由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和传播事业有领导、有计划地展开，并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逐步推进。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相比，传播领域逐渐拓展，思想理论日益丰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目的更加明确。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先河。

瞿秋白赴俄采访并报道了列宁

1919年，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和郑振铎等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1920年春，加入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考察。1921年7月，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瞿秋白以记者身份报道了这一重大活动，并第一次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列宁出席发言3、4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姿态，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成人山，演说往往被鼓掌声所吞没。会议间歇，瞿秋白在走廊里遇见了列宁并要求采访。列宁停下来与他作了简短的交谈，并指出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
(1921年7月摄于莫斯科)



瞿秋白（后排左二）与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合影

党的“三大”以后，瞿秋白负责编辑中共机关刊物《新青年》。利用这个阵地，他译介了大量列宁著作，热情地传播列宁主义，并致力于在中国的运用。

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的成立和 “马克思全书”的规划出版



李达
(1890~1966)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1年9月1日，上海成立了我们党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亲自主持。李达拟订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以使国民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系统了解。为躲避搜查，常常采取隐蔽伪装的方式，如特意把书上的社址印成“广州昌兴马路26号”来迷惑警察。



人民出版社旧址（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

李达为中共成立初期的马列主义宣传作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曾称赞他为“理论界的鲁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编印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

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4周年，全国各地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掀起了一个中国人知道马克思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纪念和宣传马克思的活动。1922年5月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举行盛大纪念会，并编印了中国第一本《马克思纪念册》。纪念册的第一篇是《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号召学习马克思，“做一个苦战斗的战士”；第二篇是德国威廉·李卜克内西撰文的《马克思传》的节译文；第三篇是《马克思学说》，简要叙述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学说。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5月5日全国共产党所在地都召开马克思纪念会，分散马克思纪念册两万册”，足见其影响之大。



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校——上海大学

具有光荣历史的上海大学创办于1922年10月，它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后该校师生闹学潮，驱逐了校方，推举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校长，邵力子为副校长，教务长是邓中夏，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共同领导、以共产党人作为主要骨干的一所学校。学校的社会学系主任是瞿秋白，中文系主任是陈望道，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等都在上海大学任教，李大钊、任弼时、鲁迅等也到校讲课。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时期党培养干部的重要机构。曾被誉为“五四运动有北大，大革命时期有上大”，“北有北大，南有上大”，“武有黄埔，文有上大”。



上海大学旧址
(西摩路，今陕西北路)



于右任
(1879~1964)



邵力子
(1882~1967)



邓中夏
(1894~1933)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 中文歌词首次发表于《新青年》

“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于1920年10、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题目为《劳动歌》,因没有曲谱,无法歌唱。1922年12月,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回国后,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于1923年6月《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并写有小序:“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劳农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懂乐谱、会弹琴,终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结束的当天,全体代表们来到黄花岗烈士墓前,在瞿秋白的指挥下,高唱会议期间学会的《国际歌》。



建立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的 马克思主义著作发行网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并印行党的宣传刊物,毛泽民曾任经理。为避免当局注意,上海书店还销售民智书局、新文化书社、亚东图书馆以及商务印书馆等机构的出版物。1925年,上海书店建立了自己的印刷所,并在国内外建立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革命书刊的发行网,销售点遍布长沙、湘潭、南昌、广州、潮州、太原、安庆、青岛、重庆、宁波、香港及国外的海参崴和巴黎。



毛泽民
(1896-1943)



上海书店旧址
(民国路振业里11号,现人民路1025号)

黄埔军校训令规定 学生均可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4年，在中共 and 苏俄的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教學和管理基本参照苏联军校的模式，除军事教育外，还有政治教育，以教授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当时的政治课程包括：《帝国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进化史》《苏联研究》等。担任政治教员的大多是中共党员，如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政治部秘书，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恽代英、肖楚女等都任过教官。军校训令中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均可阅读。以使学生对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有所了解。



孙中山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

翻译家柯柏年 因翻译列宁《帝国主义论》被学校开除



柯柏年
(1904~1985)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汕头读中学的柯柏年（1904-1985）卷入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据他回忆："五四前后，各种思想、主义，百家争鸣。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对比和研究，我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升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因参加学潮和翻译出版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被学校开除，遂转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1924年柯柏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25年，他收集了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3个英译本，相互参照，反复推敲，并出资作为上海书店"解放书丛"第1种出版。1927年1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革命》还刊出了他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全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从而进入他翻译马列著作事业的黄金时期。

中国编印的第一部《巴黎公社纪念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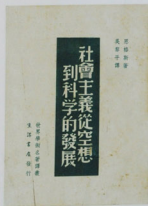
1926年3月18日，即巴黎公社起义55周年之际，广州首次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的活动。张太雷作了《巴黎公社纪念日》的主题报告，纪念大会筹备处编印了《巴黎公社纪念手册》。该手册共收录文章十一篇和两个附录，是在中国编印的第一部巴黎公社纪念文集。

此前，李大钊曾在1923年发表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系统介绍了巴黎公社的起源、性质、经验等，而“巴黎公社”的译名则为瞿秋白首创并很快为人们所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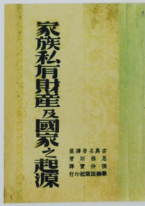


张太雷
(1898~19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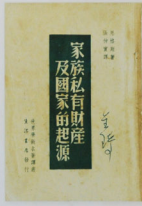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早期出版物



恩格斯著、吴黎平译
生活书店，1946年5月出版



恩格斯著、张仲实译
重庆：学术出版社，1941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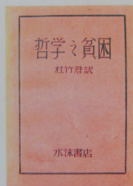
恩格斯著、张仲实译
生活书店，1947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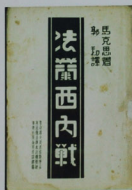
马克思著、沈志远译
生活书店，1939年8月出版



马克思著、杜竹君译
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10月出版



马克思著、杜竹君译
上海：水沫书店，1929年出版



马克思著、郭和译
上海：海潮社，1939年4月出版



马克思著、吴黎平、刘云译
生活书店，1946年5月出版



列宁著、刘莹平译
上海：启智书局，1929年6月出版



列宁著
新知书店，1938年3月出版



列宁著、苍木译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47年出版



列宁著、P生译
上海：中外研究学会
1929年7月出版



列宁著
汉口：新生书店
1937年出版



列宁著、莫师古译
1938年3月出版



列宁著。吴凉译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1930年2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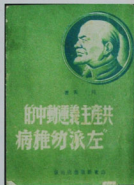
列宁著
西安：先锋社
1937年出版



列宁著。纪华译，
汉口：中国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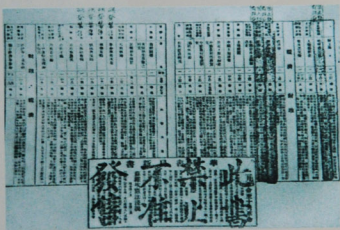
列宁著。苍木译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47年出版



列宁著
山东：新华书店
1948年出版

第四章 艰难岁月

白色恐怖下传播真理的壮丽诗篇



1927年的国共分裂，中国政局开始了新的阶级力量组合。国民党逼迫一切革命力量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寻找、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和斗争形式。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共产党人怀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利用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手段坚持翻译和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进步人士也秉持着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谱写了一曲百折不挠地传播真理的壮丽诗篇。

国民党统治区野蛮的文化“围剿”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在对中央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也进行了野蛮的“围剿”。他们抛出了许多条文，对进步书籍、杂志严加限制，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对国民党政府不满和宣传进步思想的著译都以“危害中华民国”等罪名加以查禁。据统计，仅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刊就有228种。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发的《中央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中，查禁了676种社会科学书刊，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国民党当局逮捕进步书刊的著译者和出版者，查封进步书店，甚至利用暴徒袭击和捣毁神州国光社等文化机构。



国民党当局查禁的部分书刊

秘密创办上海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

1927年的“4.12”政变后，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先后在汉口和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另一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被迫转入地下后也于1929年被国民党查封。之后，我党又在上海秘密创办了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这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传播和鼓舞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华兴书局还精心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小册子，其中包括马恩论著6篇。华兴书局遭到破坏后改名“启阳书店”，后又更名为“春阳书店”，为在国统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江书店旧址（汉口）

白色恐怖下改头换面的“伪装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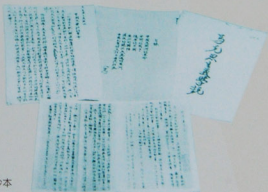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局收藏的“伪装书”

1930年前后，马列著作被列为禁书，不得不采用各种伪装来掩护。有的做成通俗读物形式，有的将书名改头换面，有的易换著译者姓名。例如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作者署名就用卡尔·因斯。1930年出版华岗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书名改换成《宣言》。党的地下书店为了免遭查封，也经常更换名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如此之多的“伪装书”存在，恰而证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思想的残酷镇压，更映衬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者的勇气和智慧。

中央苏区发现马列著作“手抄本”

为满足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需求，在纸张和印刷设备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革命根据地仍然想方设法印刷出版马列著作，没有好纸用土纸，没有印刷机用油印、石印或木版印刷。瑞金曾用木版印刷了一批《共产党宣言》。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和封锁，上海等地出版的进步读物运送到革命根据地的数量很少。苏区干部为了学习和掌握革命理论，有的一字一句地抄写马列著作。其中发现一本用毛笔抄写的、收有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全文，字迹工整，可见抄写者异常认真。



马恩著作的手抄本

翻译家吴亮平和《反杜林论》的出版

吴亮平（1908-1986），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精通英文、俄文和德文。1929年从苏联回到上海，任职中共中央宣传部，参与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时开始翻译恩格斯巨著《反杜林论》。白天，他以教师的身份在大学代课，晚上则埋头于简陋的亭子间里挥汗翻译，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在上海江南书店出版。

1931年，毛泽东率领红军打下福建时，从战利品中发现了《反杜林论》，就一直带在身边研读。吴亮平进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高兴地称赞他“功盖群儒，其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又对吴亮平说：“一些东西我可以不带，《反杜林论》我却带来了，还要继续学习啊！”



长征到达陕北时，
吴亮平在毛泽东窑洞前留影



被誉为“革命文化堡垒”的 生活、读书、新知书店

20世纪30年代，上海创立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出版社，是宣传介绍马列主义著作的重要出版机构。1932年，由邹韬奋先生创办了生活书店。书店有计划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包括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935年，由地下党员徐雪寒创办新知书店，1940年书店内迁武汉后，以“中国出版社”名义出版了大量马列著作，这些书稿由延安负责编辑，然后秘密送交武汉出版。1936年，由李公朴、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人创办读书生活出版社，该社最早出版的艾思奇《大众哲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启蒙作用。



生活书店旧址
(上海陶尔斐斯路48弄弄口，
今南昌路东段)



1937年黄洛峰（左四）
在汉口与读书生活出版社同人合影



昆明华山路新知书店分店
(1939年)

鲁迅和左联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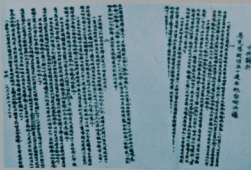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在中共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创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几个左翼团体，形成了一支浩荡的左翼文化大军。冯雪峰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8年12月通过柔石介绍，在上海结识鲁迅，与他共同编辑《科学艺术论丛书》。左翼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从此有了《萌芽》《前哨》《北斗》等刊物。1930年，鲁迅翻译出版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1932年，瞿秋白将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信件，整理编译成《现实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

革命根据地开展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

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各种纪念活动。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的决议》，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中央苏区，在战火中也开展了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党的机关报《斗争》发表了尚昆写的《马克思逝世50周年》专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发表了社论，号召根据地军民“努力学习革命理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武装自己，用一切锐利的武器去粉碎敌人，为全中国的苏维埃胜利而斗争！”



在战火中开展马克思纪念活动



《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的决议》

我国翻译出版的《资本论》若干版本

1920年10月，上海出版的《国民》月刊第2卷第3号上刊载了署名“费觉天”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即《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该书第1卷第1分册，即《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译者陈启修，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

1932年~1933年，北平东亚书店出版了潘冬舟译《资本论》第1卷的第2、3、4篇。由于叛徒的出卖，1935年潘冬舟被逮捕枪决。

1927年春末，《资本论》第1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侯外庐和王思华翻译。1932年9月出版了上册，1936年世界名著译社出版中、下册和第1卷合订本时，译者改用笔名“玉枢、右铭”。

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半农译、千家驹校订、据英文版译出的第1卷第1分册，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编辑。



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完成 《资本论》第一个全译本

1927年，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的郭大力留在上海一所中学教书，半年之后，因有向学生进行“赤化宣传”的嫌疑被解聘。出于对国民党高压恐怖的愤慨，他决定凭借自己的能力译出全本《资本论》。

1928年，郭大力在杭州大佛寺巧遇因生活所迫寄居于此的王亚南。两位热血青年一见如故，在郭大力的鼓动下，王亚南决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郭大力合作翻译《资本论》。为此，他们拟定了“大佛寺计划”：先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用这种翻译，作为一种细密研究的手段，为全文翻译《资本论》积累经验。最后，他们以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完成了《资本论》3卷的翻译工作，1938年该书的第一个全译本在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发行。



郭大力
(1905~19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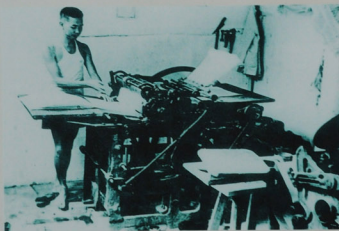


王亚南
(1901~1969)



国统区和苏区谱写了 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壮丽诗篇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在极其困难且险恶的条件下坚持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一地，翻译出版的马恩著作、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就达50多种。在苏区，成立了“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设置了编译部。据不完全统计，仅1930年至1934年，苏区就出版了各种教科书28种，报纸、杂志16种，政治读物和社会科学书籍69种。党的机关刊物《斗争》也发表了若干列宁文献。



中华苏维埃政府印刷厂

第五章 源头活水

延安时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时代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出版、研究和学习的高潮。1938年，我党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机构“马克思列宁学院”，不仅集中翻译了一批马恩列斯著作、提高了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创新能力，而且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宣传家，形成了“严谨治学，无私奉献，追求理想，传播真理”的精神，影响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研究、传播工作者。毛泽东带头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和大众化的新时代。

张闻天主持延安马列学院工作



张闻天在陕北

1938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马克思列宁学院”在延安兰家坪成立，下设两个部，干部培训部和编译部。延安马列学院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一个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它的诞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是我党创建的第一所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做出了很大贡献。

马列学院编译部专门负责翻译和编辑马列主义著作。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任马列学院院长，兼任编译部主任。他和吴亮平一起重新译校了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翻译的《法兰西内战》，并分别以笔名吴黎平和刘云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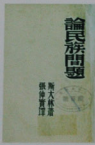
马列学院旧址

张仲实主持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

张仲实是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编辑出版家，曾留学苏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期间，有计划地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包括以“世界名著译丛”名义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工作之余，张仲实规定每晚至少抽出两小时翻译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苏联学者的著作。由于他的勤奋，仅1936—1937年，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1940年5月，张仲实离开生活书店，奔赴延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主持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的工作。解放后，张仲实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他的一生献给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与传播事业。



张仲实
(1903-1987)



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集

1937年4月，在莫斯科工作的中国人方乃宜辑译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印行。该书收入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文章和重要论述。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马恩有关中国的文章18篇，这些文章是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写的，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对外反抗列强侵略、对内反对腐败清政府的英勇斗争时期。马恩十分关怀中国人民的斗争，并寄予深切的同情。第二部分是摘录、收录了马恩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各种著作和书信中有关中国的论述。1938年5月，延安解放社重版了此书。同年，上海珠林书局再版时，曾采录了该书的第2章，改名为《中国问题评论集》。

1939年3月20日，汉口中国出版社初版此书，书名省称《马·恩论中国》，内容和1937年莫斯科的中文版完全一样。



延安创立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马恩丛书”

为适应广大干部的学习需要，党中央在延安建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部长由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富春担任。解放社是隶属于出版发行部的、专门出版马列著作的机构。当时的清凉山上印刷条件很差，没有像样的厂房和印刷设备，纸张短缺，就用陕甘宁边区自产的马兰草纸。1938-1942年，延安解放社曾用“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形式，出版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封面除了书名以外，还用阿拉伯字母3-12编号，总共10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



中央印刷厂员工合影



中央印刷厂的排字车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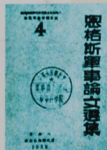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

建立军委编译处出版第一本恩格斯军事论文集



曾涌泉
(1902~19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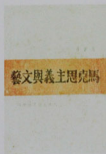
1938年，中央军委决定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作为军事干部的必修课目，专门抽调了一些懂外文的同志，建立了由曾涌泉领导的军委编译处。编译处最早译出的恩格斯军事论文是《冲锋》和《军队》，先后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1939年底，由焦敏之译、曾涌泉校的《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作为“抗日战争参考丛书”第4种在延安出版。这本选集收入了恩格斯的5篇军事著作：《军队》《步兵》《炮兵》《骑兵》和《欧洲军队》。它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不仅在战火燃烧、烽烟弥漫的抗日战争中，而且在红旗漫卷、捷报频传的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应有的威力。



延安鲁艺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

1940年，鲁迅艺术学院出版了“鲁艺丛书”之一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该书的译者是曹葆华和天蓝（王名衡），由主持该院工作的周扬编校。

为了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周扬还编纂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分为《意识形态的文艺》《文艺的特质》《文艺与阶级》《无产阶级文艺》和《作家，批评家》五辑。



鲁迅艺术学院校门

第六章 理论基石

建国后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整体推进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

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前，公开出版的马列著作中译本已达530余种，但从整体上看，仍有大量文献尚未翻译介绍，已经出版的译本质量参差不齐。新中国的建立，为编译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也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编译局和人民出版社的成立，为系统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合改革开放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编译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已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特点。进入21世纪，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将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基石。

重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典著作

1950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在京重建。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人民出版社”。凡是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恩列斯的各种全集、选集、著作单行本、专题本、汇编本，均指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保证其质量和权威性。该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普及性读物，党史和党建论著；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文化、国际问题等学术著作。先后出版图书万余种，发行图书期刊超过20亿册，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国家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1950年毛泽东为人民出版社题写的社名



人民出版社成立大会签名纪念



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时合影（局部）

成立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1958年中央编译局领导、
马恩室全体同志与苏联专家合影

1949年，中央刚进北京城不久，周恩来就亲自起草了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的决定，并于1949年6月成立。此后，中央又在中宣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1月29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这里集聚了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丰富翻译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也有从各地调来的年青人。他们殚精竭虑、锲而不舍地工作，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50年代中央编译局举办的展览

中央关于成立中共中央
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决定的草稿手迹

三大全集的翻译出版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

195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翻译工作启动。1956年12月第一卷与读者见面。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的10年间共出版了21卷。1974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齐了正卷39卷。1977年起根据苏联新增补的俄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卷进行翻译,至1985年12月,中文第一版50卷全部出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始于1954年。到1959年国庆10周年止,38卷《列宁全集》只用了6年时间完成,这在我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创举。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中央编译局以《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为基础,选编出《列宁选集》4卷本,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人民日报》为《列宁全集》
出版刊发的广告(1959年10月)

《斯大林全集》13卷,从1953年开始至1958年全部译完出齐,是新中国成立后马恩列斯全集中最早出版的。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列著作还被作为蓝本,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版和盲文版。1975年,党中央批准筹建了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用蒙、藏、维、哈、朝五种民族文字翻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列主义著作。



50年代中央编译局工作会议照



我国出版的民族语言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专题言论集和单行本的出版

在三大全集翻译出版的同时，还翻译和编译了一大批马恩专题言论集，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1954）、《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195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不断革命》（195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195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96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196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1961）、《马克思恩格斯论殖民主义》（1962）、《论印度民族解放起义》（1963）等。此外，人民出版社为了方便广大读者的学习，还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的单行本。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

论巴黎公社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

全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文献宝库



20世纪60年代建成的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书库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是全国最大的马克思主义专业文献机构。建馆初期，党中央将苏共中央赠送的8000余册俄文图书转赠该馆作为奠基馆藏。1959年，毛泽东将前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赠送的104册精装德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连同书柜一起赠送该馆。此外，该馆还收藏了大量来自国内外机构和个人的捐赠。目前藏有各种文献50余万册(件)，其中60%以上为外文书刊，如各种原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集、选集和著作单行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各种珍贵文献，以及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史方面的文献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苏共中央的俄文赠书

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央编译局成立之初，中央就为之配备了学者型的领导团队。首任局长为原中央俄文编译局局长师哲，先后到任的副局长有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



师哲
(1905~1998)



陈昌浩
(1906~1967)



姜椿芳
(1912~1987)



张仲实
(1903~1987)

除了中央编译局的专职人员外，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及著名学者如叶圣陶、吕叔湘、宗白华、季羡林、曹葆华、贺麟、芮沐等积极加入到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



叶圣陶在《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的修改稿



叶圣陶
(1894~1988)



吕叔湘
(1904~1998)



宗白华
(1897~1986)



季羡林
(1911~2009)



曹葆华
(1906~1978)



贺麟
(1902~1992)



芮沐
(1908~2011)

思想的春天

改革开放后，全面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收载列宁文献最全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1982年5月，党中央作出我国自行编辑新版《列宁全集》的决定。中央编译局以俄文第五版为基础，进行校订、勘误和增删。翻译人员对列宁著作中大量专有名词、译名和典故做了考证，统一译法，编写出版了140多万字的《列宁著作资料汇编》和约50万字的《列宁著作典故》，编发了近100期的《译名通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于1990年12月出齐，期间有11位同志逝世。全集共60卷，收载列宁文献近万件，是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全的版本。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出版发行是我国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中的大事。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



列宁手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1986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了中央编译局关于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报告。新版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同时参考德文、英文、俄文等版本，所收文献全都按照原著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总计70卷，1995年首批卷次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21卷。



关于重新编译出版马恩全集中文版的请示报告

电视文献纪录片 《共产党宣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998年，由中央编译局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的两集电视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电视文献纪录片运用珍贵的资料和独特的镜头，全面、准确、形象地再现了《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创作过程、基本内容和传播历程，揭示了这部著作深厚的历史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精神，并且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体现其当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于观众了解《共产党宣言》诞生发展的曲折命运，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都有所裨益。



重新审核和修订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出版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工程的一个重点项目，就是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重点著作的译文，编成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的《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于2009年12月出版，成为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对于学习、研究、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